

烦恼和焦虑从生的时候埋头工作总是不错的,还有报酬。用以告知自己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人的欲望降低之后(主要是没有心气了,这个世界是给年轻人准备的,合适的东西越来越少),钱就显得没那么要紧,包括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事业成功不差钱却也轻松不下来的,如果已经离开了重要岗位反而有点找不到北,这么多年努力工作的后遗症就是身心还是备战状态,很难松弛,凡事跟自己较劲。

慢慢适应一种半退休或者退休状态有一个过程,只要天下太平就好。可是有一种情况个人没法掌控就是生病,统计学说认真工作的成功人士常常会在退下来两年的时间里罹患癌症(以前忙成一个超人都没什么事)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最近一段时间苏东坡超火,属于妥妥的顶流网红。

我想了半天为什么浪淘尽千古英雄而独有他被人们津津乐道,各种故事和名作被反复吟诵。他老人家无疑是才情兼备个人魅力闪闪发光的人,但是有一个独特的气质是许多英雄豪杰所不具备的,那就是散淡。苏东坡绝对是一个散淡的人,尤其是在逆境中他都没时间生气,一会儿研究菜谱一会儿吃荔枝,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哪怕是一件落到我们头上恐怕也是人生尽毁吧。

我想他翻红的原因是我们意识到了除了没有盖世的天赋,更加没有他身上那种散淡、松弛、爱谁谁的气质。

所谓成功,就算按世俗的标准不差钱已经很难,但是能够从心底不看重得失的、能够感受平凡生活之美好的、能够不自恋不端着做人的真心不多,有时候活得累活得孤独活得高处不胜寒,其实都是不够散淡而已。

我们常说这个世界是平的,但实际上也还有无数看不见的阶梯,每个人能站在自己终身成就的阶梯上都是一番番彻骨爬上来的,内心很难轻视这个位置更加不想下台阶。可是人就是这样,你不下来就不可能有下来的认知,其实众生平等并非否定我们高级过,可最终人都是一样的普通。

散淡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点不在乎,又有一点点无所谓。

那些抹杀不了的成绩只是我们自己看得高山仰止,跟别人没有关系。反而我们的缺点和需求却和普通入一模一样,生病不会比别人好得快,情绪低落同样渴望温暖和鼓励,遇到塞车你会飞吗,不会,对不对。

所以要学会放下身段,人家苏老先生的丰富来源于他的散淡,神奇的是他的一切并没有被时间遮蔽。

同时他未必算得上成功富有,却活出了人间的至味和清欢。

也说散淡

张欣



纸博

从博物馆看卡夫卡

何亮亮

10月下旬有布拉格之旅,其间特地参观了卡夫卡博物馆。

在欧洲的名城中,布拉格有一席之地,尽管人口只有百万,但一直为外国游客所垂青。布拉格是文学名城,以《好兵帅克》著称的哈谢克,当代的赫拉巴尔、昆德拉,都是读者熟悉的。当然,更不能不提的,就是弗兰茨·卡夫卡。这位面容清癯忧郁的作家只活了41岁(1883—1924),其创作影响之大,在20世纪难有其匹。比卡夫卡晚些时候的法国作家加缪,影响或几近之,加缪也只活了47岁(1913—1960),而加缪最推崇的作家就是卡夫卡,从《审判》到《瘟疫》,正是用文学透视“荒诞”,把这两个大作家联系在一起了。

卡夫卡有三重身份:说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说捷克语的布拉格人、说德语的奥匈帝国公民。把卡夫卡列为奥地利作家固然没有错,但布拉格人一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因为卡夫卡一辈子生活在布拉格。卡夫卡出生的时候,捷克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的官方语言是德语。首都则是维也纳。卡夫卡时代的奥匈帝国虽然已经衰落,当时的维也纳仍然与巴黎齐名,轻歌剧《风流寡妇》折射的就是那种世纪末风情,当

然维也纳还有马勒、弗洛伊德等著名音乐家和学者以及一批在咖啡馆聚集的物理学家,他们被称为“维也纳学派”。

不过卡夫卡和这个维也纳没有精神上的联系。他的独特思考和创作,基本上来源于他在布拉格的生活,没有布拉格就没有卡夫卡。参观了卡夫卡博物馆,加深了这一认识。

卡夫卡博物馆在布拉格西面,在伏尔塔瓦河畔(这条河流由斯迈塔那作曲的同名交响诗而广为人知),搭地铁就能到达。博物馆掩映在一片民居和餐馆、商店的建筑物群中,不好找。游客很多,都是到河边搭乘河上半日游的,故找到博物馆之后,发现参观者屈指可数,有些窃喜。

这个博物馆内部的设计非常独特,里面是昏暗的,有三层楼,楼梯、走廊和房间里的陈列品都有灯光,绝不至于要摸黑寻路,因此一进入,一种身在城堡内部,或是身在某种幽暗世界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应该是设计者的初衷,特别契合卡夫卡的世界。

卡夫卡的社会生活很平淡,很枯燥,父亲是犹太商人,为人专制,不喜欢卡夫卡那种精神,父子关系恶劣,但是卡夫卡却留下数百封给父亲的信,是研究者的宝库。博物馆陈列



绿水羽毛犹更茸

齐铁偕 诗书画

从大山奔下来的水愈来愈深/也愈来愈清/浮起的羽毛像游动的刷子/拂拭着镜面/还有镜面上的蓝天

了一部分卡夫卡致父信的手稿。卡夫卡在布拉格接受了德语高等教育、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此后的大部分日子即以保险公司的法务工作为生。

卡夫卡是犹太人,但不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对于争取社会公正的思潮就有兴趣,读马克思的书,也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他不积极参与政治,终其短短一生,最大的兴趣和最多的精力用于文学创作。

设想一下,一个住在布拉格的犹太青年,平时说捷克语和德语,用德文写作。白天是一个保险公

司的法律人,做的是枯燥无趣的工作,晚上是狂热的写作者,他对生活、对社会的思考,全都在写作中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字世界,从《变形记》到《城堡》到《审判》等等,卡夫卡留给同代人和后代的,是他那奇幻的文学世界,读者从“卡夫卡式的荒诞”中,看到的是自己和自己所生活其中的世界,这不能不是卡夫卡对文学的最大贡献,尽管他生前没有得过任何文学奖,甚至他在世的时候大部分作品也没有出版。

所以身处博物馆,我忽然觉得明白了设计者的匠心,这幽暗的世界正如

卡夫卡生前所处的环境,并非地狱,却是一个郁闷的所在,这样的环境和卡夫卡与生俱来并且逐渐发展的文学天分是一体两面。

走出博物馆,布拉格秋色宜人,街头熙熙攘攘,各国游客兴高采烈观光,和博物馆真是两个世界。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闺蜜家每年都搞新年派对。我参加过两次。吃够喝够,我们十来个人看电视里的新年音乐会。屋顶升起彩色气球,人人手举一杯香槟,真是兴奋迎新了。今年的新年派对,闺蜜要求每个来宾带一个兔子艺术品,大小不拘。看看谁的创意最好。闺蜜夫妇都属兔,今年是他们的本命年。

闺蜜是一个爱热闹的人。记得十年以前的某一天,跟她两人的有趣对话:

“家里的钱都是我管的。每当我生日或者结婚纪念日,老公就说,‘你去挑自己喜欢的礼物,反正我的工资卡也交给你了。’我就给自己买一块玉啦,一根手链啦,换部更好的手机啦,我的‘大件’也就这样添起来了。”

“真是好老公啊!就差买花送你了。”

“是的。我们家种花,不用买花。”

我和我老公各持各卡,实行AA制。闺蜜的一番话当时觉得似乎哪里有点不对头,但终究还是起了作用。50岁生日的时候,我也效仿添个“大件”,于是对老公说:“结婚第三年之后,你什么礼物也不送了。老婆五十大寿应该送这个礼物吧?”

“好啊!”老公仍然很爽气地回答。

项链是戴上了,没啥幸福感。这算礼物吗?送礼应该是有仪式感的。电影里的镜头都是这样的:酒店,好菜,微醺。男人把漂亮的盒子递上来,神秘一笑:“打开看看吧!给你的礼物!”“啊!太好看了!我喜欢!”女人激动得有些夸张。

自己的礼物自己挑,没有惊喜不算,这下,连付钱的环节都省

美丽的加法

罗莉

了。中国男人的懒惰可不就是中国女人培养的?

有一阵子,我们嘲笑日本人送东西,大盒子里面中盒子,中盒子里面再小盒子,核心包裹着的可能就是一枚樱花甜点。

所谓“礼轻情意重。”要的是那个仪式感——美丽的包装,拆礼物时的小心翼翼,最后宝贝拿在手里的喜悦。像欣赏一首乐曲,讲究的是整个过程。

想过没有?所有的仪式都是做加法的。日常生活的加法。仪式感既是对庸常的改变,又是对日常的提升。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来说,改变与提升都是需要的。办场生日派对,吃饭的桌子上好看的桌布,有鲜花,有饮料,有音乐,大家一个个再递上送给寿星的礼物。礼物一定是费心包装好的。女儿5岁时,被指定做表哥结

婚的小花童,需要手挽着小花篮,在一对新人步入礼堂时,在他们面前撒花瓣。表哥贴心地发给她置装费。我们替小姑娘买了一件泡泡袖小公主式的昂贵裙子。这件裙子,在婚礼结束之后,一直摆在衣橱里,结果也只穿了一次。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一物一用,就是最宝贵的仪式感了。女儿的小花童体验,那种美妙、享受、荣耀,一直存在她童年的记忆里。

“你很重要!”——参与到这种重要仪式之中的小孩,从小被这么鼓励过,她也见识了大人生活中庄重的那一面,长大以后,她会爱自己爱生活。

看电影中某些葬礼场面,小男孩身穿一身精致的黑色西装,神情严肃地站在父母身边。那种感觉,与看女孩做花童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小孩,你很重要!”

服装的要求,礼仪的要求,做加法的仪式感,就是一次对你自己的肯定。谁说每个大人的心中不住着一个小孩呢?热聊的气氛,真诚的沟通,做加法的仪式感,就是一场心灵能量的舒服释放。谁说每个大人不想像小孩一样要赢得他人的喜欢与认同呢?

每个大人也会像小孩一样喜欢新年在屋顶升起的彩色气球。红的,黄的,蓝的……但愿生活七彩,希望无边,笑脸灿烂。

十日谈

生活中的美好

在生活中加入一点清欢,平常的日子就有了诗意。

责编:郭影

邂逅残本

陆其国

书,自然也包括残本书。区区如我辈虽比不得郑振铎这样的大家,但经过数十年淘书岁月的历练,作为一名“书虫”的体验,说起来终究也是印象深刻,深铭难忘。于我而言,主要钟情于中国近现代史料的搜集、收藏和研究,其中就发生过不少邂逅残本书的故事;而且有的残本书还是经历累次邂逅,最后终于使它们完整成套,从而消弭了残本之残的遗憾。

印象深刻的就有上世纪四十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起,A·W·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一书,中译本有130万字,分上中下三册。尽管当时我见到时只有上中两册,缺失下册,但因为是外国人所编,又是颇具知名度的中国清代大型人物传记辞书,不乏参考价值,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购下了这部残本书。只是从此以后就一直念兹在兹惦记着那本缺失的下册。直到很多年后的某月某日,在一处书肆冷摊上与之邂逅而遇,这才终于释怀。而更不易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经历累次邂逅方到手的那类残本书。之所以更不易,是因为这样的大部头书一套有多册。比如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7月出版的全套八册的《辛亥革命》一书,我就是在先淘到五本残本书的情况下,历经多年,才终于在一次次惊喜邂逅中,将所缺失的其他三本残本书陆陆续续先后收获到手,从而成全了这套书的完整。大凡这样的故事,相信在许多“书虫”身上肯定也发生不少。

当然,不尽的遗憾肯定也是依然存在的,兹举一例:如被胡适视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北大教授吴虞,他有一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的上下两册《吴虞日记》名世。这部日记对于解读吴虞其人,以及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极具参考价值。遗憾的是我十多年前淘到上册后,至今也没能邂逅到下册,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件憾事。其实人生总有遗憾,阅世如此,视残本书亦然,大可不必耿耿于怀。

